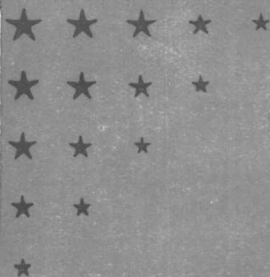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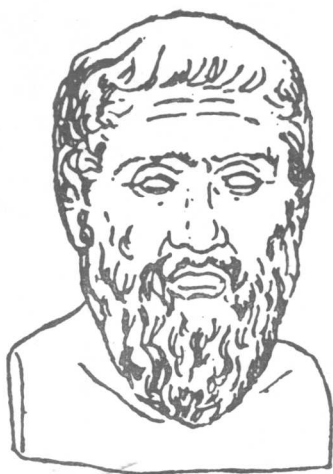


古希腊三哲人名言录

肖传林 编

世界贤哲箴言集萃

主编 石非



吉林教育出版社

世界贤哲箴言集萃

古希腊三哲人名言录

肖传林 编

吉林教育出版社

世界贤哲箴言集萃 古希腊三哲人名言录

肖传林 编

责任编辑：王保华

封面设计：王劲涛

出版：吉林教育出版社 787×960毫米32开本 5.75印张 2 插页 95 000字

发行：吉林省新华书店 1990年11月第1版 1990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 226册 定价：2.45元

印刷：长春新华印刷厂 ISBN 7-5383-1168-8 / I·26

影响人类的三代哲人 (代序)

欧洲文明的故乡古希腊，为人类贡献了三代哲人。他们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被称为希腊圣哲的苏格拉底（前469—前399），出生在希腊著名的文化之乡——雅典。虽然是堂堂正正的雅典公民，但他出身卑微，父亲是一位雕刻师，母亲是一位接生婆。他生来很丑，鼻梁塌陷，而且肚子很大。也许由于其貌不扬，他的父母并没有对他抱有很大的期望，只不过要他学点雕刻技术而已。成年后的苏格拉底是一个脾气古怪的思想家，身上一一年四季披着一件破旧的大氅，在冬天也不穿鞋，光着脚和别人在冰上走。他的生活简朴至少一部分是由于经济的原故。自从放弃了雕刻生涯，当上了哲学家，他就穷了起来。他白天在街头巷尾和无业游民“谈话”、“讨论”、“争执”，这种事业当然不会给他带来用以养家的收入，于是到了晚上，他就要去聆听妻子的唠叨。有时，他一见到妻子的身影就心惊肉跳，望风而逃，在这里一切超人的哲学都不管用

了。他也当过兵，任过执政官，曾被选进五百人议会。然而他的主要成就还是在于他的思想。他在自己的思想活动中，创造了一种方法——产婆术。苏格拉底在和别人争论的时候，总是先来一套带有芒刺的恭维赞美的话，然后用看来愚昧的话来反驳别人看来充满智慧的言论，用一连串无法回答的问题来拆除别人立论的基础，同时建立自己的新的立论基础，直至达到无以驳难的程度。就是用这种方法，这位口头评论家表现了绝顶的智慧。久而久之，他的名字在希腊家喻户晓，以至他在上午的谈话，可能到了晚上便全城无人不知。由于超凡的智慧，在他周围聚集起一大批青年求学者，然而，这却导致了他的杀身之祸。他被指控：不敬雅典正神，自创邪教迷惑众生，散布邪说败坏青年，并因而被判死刑。尽管在临刑前还有一些办法可以免于一死——或向法庭认罪求赦，或逃跑，或交一笔赎金，但这一切都被苏格拉底拒绝了。他在谈笑辩论中静待死神的到来。他的这种“迂”劲，表现了苏格拉底精神中那种传统的菁华：为真理、为荣誉、为法律，即为理想献身的精神。

苏格拉底死了，但他的思想被他的学生们广泛传播。他的著名的学生柏拉图（前427—前347）在古今中外的思想家中，可说是天之骄子。柏拉图的祖先当过雅典的皇帝，母亲是大立法家梭伦

的后裔，可说是名门望族。他自己生来漂亮，仪表堂堂，肩宽背阔。他有强烈的求知欲，尤其注重追求智慧。他和他的同学投师苏格拉底，对苏格拉底衷心敬佩，唯命是从，随苏格拉底穿行大街小巷，逢人发问，辩疑解惑，传播智慧。他当过骑兵，画过画，写过史诗和悲剧，也曾想从事政治活动。在苏格拉底死后，柏拉图被迫远走避难，游历了许多地方。回到雅典后，柏拉图40岁，这时他已博学多闻、胸罗万有了。加上这时苏格拉底事件已被人们淡忘，于是他在雅典城外的一个公园里创办了一个学术院——柏拉图学园，讲述苏格拉底主义或柏拉图主义。由于柏拉图出众的口才和思想，任何获准在柏拉图学园听他授课的人，哪怕是只听很少几次讲课，都心甘情愿跋山涉水来到学园听讲，其中包括著名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柏拉图力图制造一个“理想国”，企图以“内圣外王”的政治哲学培养一个圣哲明君。结果他也遭到指控，虽然幸免一死，但被官方拍卖为奴。后来是一个爱好哲学的奴隶主恢复了柏拉图的自由。最后，在一个朋友的婚礼的欢笑声中，他到死亡的理想国中享受永久的和平去了。

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是苏格拉底传统的最后的最伟大的拥护者。他18岁的时候加入柏拉图学园。虽然他不是雅典人，但他有显赫的

家世。这个来自斯塔吉拉的贵族神童，衣着华丽，举止儒雅，声调柔和，有时故作斯文。他的老师常告诫他，一个追求真理的人不应该过分打扮，但他并不是金玉其表，败絮其中的花花公子。他有过人的才智，强烈的求知欲和广泛的兴趣。他在那个时代已经通晓了许多尚不为人知的事情，为人类的知识宝库增添了丰富的宝藏。他的著作涉及到政治学、戏剧学、诗学、物理学、医学、心理学、历史学、天文学、伦理学、自然历史学、数学、修辞学和生物学，等等。在他以后的几十代欧洲人和亚洲人都从中获取了丰盛的精神食粮。柏拉图曾自豪地说：“我的学园可分为两个部分——一般学生构成它的躯体，亚里士多德代表它的头脑。”柏拉图死后，亚里士多德因是异乡人，被迫离开了柏拉图学园。游历了一段时期以后，亚里士多德被马其顿国王聘作亚历山大的家庭教师。他也想用“内圣外王”的哲学来改造亚历山大，希望大展宏图。但是他的一套内圣外王之道并未为亚历山大所采用。于是他只好象斗败的公鸡似地回到雅典。政治生活的失败使他厌倦现实生活，退守精神的堡垒，潜心研究学术。他在雅典阿波罗神庙附近的一座花园里开办了自己的学堂——莱森学园，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学生。幸运的是，他学而优则富，马其顿国王为他提供了一笔数字相当可观的学术研究费，他雇佣了大量的

助手到世界各地收集资料标本，然后将研究成果编入他的哲学科学百科全书里。在学园里，他传道授业，上午给高级班的学生讲科学技术，下午对一般听众发表常识性讲演。这时他年过50，头顶光秃，大腹便便，但仍然衣着整洁，精神饱满，讲起话来词锋犀利。他讲课时从不坐着，而是边讲边踱，于是人们叫他“散步的哲学家”。平静时代很快结束，建立世界帝国的亚历山大一死，雅典人就起来反击亚历山大的朋友，亚里士多德为了避免苏格拉底的悲剧，被迫逃亡在外，终于客死它乡。

尽管哲人们的生命很短暂，但是他们的思想却长存。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三哲人给人类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苏格拉底在欧洲哲学史上起过划时代的作用，从苏格拉底开始，人们开始从“自然”谈哲学转到从“自我”来谈哲学，在真正的哲学意义上发现了“自我”，发现了“人”，这给哲学带来了积极的重要成果。他突破诡辩论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观点，而声称“人的无形意识是世间万物的最后尺度；塑造命运的不是神而是我们自己”。苏格拉底完成了物质与精神的进一步分化。他对于肉体情欲的驾驭，是常常为人所强调的。他很少饮酒，但当他饮酒时，他能喝得过所有的人，从没有人见他醉过。在爱情上，哪怕是在最

强烈的诱惑下，他也始终是“柏拉图式”的，在天上灵魂与地上的肉体二者的对立之中，他做到了灵魂对于肉体的完全的驾驭。在他的哲学体系中的“理念论”，首先是一种科学知识的体系，是掌握千变万化现实世界的本质规律的工具，而这种工具是人（灵魂）通过语言创造的。他的理念不仅具有属性的意义，而且具有勾通主体与客体、一般与个别、抽象与具体之关系的作用。他说，“理念”与“知识”、真理以及“灵魂”是不可分的，“知识”是对真理的掌握，但光靠感觉是不能得到这种知识的，要用“灵魂”来掌握它。他说：“人只要具有自己的道德和信念，即使没有朋友的赞同，没有金钱、妻室和家庭，也会成功。”苏格拉底在其伦理学中，强调道德与知识的统一：一方面把道德提高到知识的水平，使伦理学科学化；另一方面，把知识提高到社会的水平，使知识人化、社会化。人们认为苏格拉底把伦理学知识化是一种功利主义，因为他说：“知识即美德，无知即罪恶”。他认为真、善、美是三位一体，不可分离，天地间的事物不美也不会真，当然也不会善，美代表和谐、匀称和矛盾的统一。

苏格拉底的思想在其著名的学生柏拉图那里得到了发展。柏拉图为了继承他的先师的功业，在柏拉图学园中讲苏格拉底主义。他在发展他的哲学中，目标与苏格拉底的相似，但范围比苏格

拉底更为宽广些。他发展了苏格拉底的著名的理念学说。他主张在我们的耳闻目睹、形色纷杂的现象世界的背后，另有一个原理的世界，即理念的世界。理念世界是原型，是正本，而现实世界则是摹本。理念学说中有一个永恒的、不变的、普遍绝对的世界，它独立于现象界。他也承认，相对性和经常变动性是物质世界的特性，是我们用感官观察到的世界。这种世界就是完整的宇宙。有一个更高的由永恒形式或理念组成的精神境界，它只有有头脑的人才能想象得到。其中最高级的是善的理念，它是整个宇宙的积极根源和起向导作用的目的。我们感官所感觉到的事物只是最高的实在，即理念的有不完整性的一方面。柏拉图的伦理哲学和宗教哲学和他的理念学说紧密相关。他和苏格拉底一样，相信真正的美德是建立在知识基础之上。但是来自感官的知识是有限的，可变的，因此真正的美德必然存在于善行，存在于公正的永恒的理念的合乎理性的领悟之中。由于把物质贬低到较低的位置，便使他的伦理学带上了温和的禁欲主义的色彩，以致于他的爱情观被称为“柏拉图式的爱情”。他认为身体是精神的障碍物，并指出，只有人的本性的合乎理性的部分才是高贵与美好的。与他的后来一些门徒相对照，他并不要求对欲望和情感的全然克制，但极力主张，它们必须断然服从理智。柏拉图从

来没有彻底地把神的概念搞明确，有时他提到神是美的思想，它似乎是从属地位的源泉，有时又说它是至高的创造者和宇宙的主宰。他想象，宇宙实质上是精神的，并为有理性的意图所控制。关于灵魂，他认为这不仅是不朽的，而且自始至终永远是先存的。

柏拉图又是一个政治哲学家，他的“理想国”对人类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这里他制造了一个优美的乌托邦的世界，为现代政治机构理论莫下了思想上的远因。他是坚定的乐观主义者，相信人类正在持续不断地进化。他认为人的生命是从低级向高级的缓慢上升，世界从美好的实体发展到美好的制度，再从美好的制度中产生美好的思想。他主张的共和国一直被那些纸上谈兵的乌托邦建设者们视为人类完美无缺的最高境界。这个奇特的共和国组织，不论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看来，都包含许多偏见。他设想建立一个不受个人和阶级的干扰，不受利己主义影响的国家。他希望达到的，既不是以民主也不是以自由为目的，而是以融洽和效能为目的的境界。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社会计划，把全体居民分为三个阶级：最低阶级代表有食欲机能的人，包括农民、技工和商人；第二阶级代表有气魄或有意志的分子，由军人组成；最高阶级代表有理智机能的人，由贵族构成。最高阶级一开头似乎是被立法者先定的，此后就

成为世袭的，但有时也可以从低等阶级中提拔有希望的孩子。最高阶级垄断政治权力。为保证最高阶级完成他们的任务，柏拉图拟定了一整套关于他们应如何被培养、如何生活的计划。第一桩应考虑的是教育。教育包括音乐与体育。音乐和体育的内容都比现在要广泛得多。音乐指属于文艺女神的领域之内的一切事物，而体育则指有关身体的训练与适应的一切事物。教育就是要年轻人训练得威严，讲礼仪和勇敢。为此，音乐和书籍要严格检查。在理想国里，男孩和女孩在未满20岁以前，都应该在音乐和体育方面打下坚实的基础。完成了基本教育之后，进行初步淘汰考试，不合格的儿童进入最低阶级，合格的儿童继续学习，从20岁到30岁专攻科学、数学、几何学和天文学。30岁时再进行一次淘汰，不能通过考试的人就进入第二阶级，通过考试的人则继续深造，可以研读哲学、练达事理，以担负起将来领袖群伦的重任。50岁后，他们从政的准备工作告一段落，便以哲学家的地位，高据要津，主持国政，从而达到“内圣外王”的境界。哲学家在理想国里是最佳的选民，他们有超人的秉赋、充分的训练、丰富的经验、远大的眼光和高尚的情操。他说：“除非哲学家变成了我们国家中的国王，或者我们叫作国王或统治者的那些人能够用严肃认真的态度去研究哲学，使得哲学和政治这两件事能

结合起来，并把那些只搞政治不研究哲学或只研究哲学而不搞政治的人排斥出去，否则我们的国家就永远不会得到安宁，全人类也不会免去灾难。除非这件事能实现，否则我们提出来的这个国家理论就永远不能够在可能的范围内付诸实行。”这即是柏拉图的“内圣外王”的政治哲学。在经济方面柏拉图提出一种彻底的共产主义，任何人除了必需的东西外，不得有任何的私有财产。城邦的目的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而不是为了一个阶级的幸福。财富和贫穷都是有害的，在理想国里都不存在。柏拉图把共产主义也应用到家庭上来，一切东西都应该是大家共同的，包括妻子和孩子在内。女孩和男孩应该受相同的教育，因为他们本性相同。在理想国里实行优生原则，小孩是市民自由交配的结果，最好的男人和最好的女人匹配，生育优秀的子女，父母的性行为不必以指定的配偶为限。他们要为国家完成生育优秀国民的责任，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和别人发生情爱和性行为。男女双方都可以自由恋爱，因为私人行为在不妨碍他人幸福和自由的范围内，不受国家的干涉。父母不知道自己的孩子，所以有许多孩子，儿女也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所以有许多父母、兄弟、姊妹。这样培养起来的人，其私心就会慢慢消弱，公德心就会慢慢增强起来，从而使国民都具有各自的应有的德行，实现“公正”。然而，柏

拉图把他的“理想国”从幻想拖到现实中时，“理想国”便被摧毁了。

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似乎不象其先师那样溺于理想，而是非常注重具体和实际。他与审美家柏拉图以及公然宣称向树木、石头什么也学不到的苏格拉底不一样，是一个对生物学、医学、天文学有无穷兴趣的科学家。而且他比他的两位前辈更少倾向于心灵观点。他也没有他的两位先师那样强烈的对贵族政治的同情心。当然他和柏拉图、苏格拉底有一脉相传的地方，比如同样地对绝对知识和永恒规范十分感兴趣。亚里士多德同意柏拉图所说，一般理念（或形式）都是实在的，而来自感官的知识是有限的、不准确的。他不同意他的老师把一般说成是独立的存在，把物质的东西降到只是它们的精神模式的黯淡的反映。相反，他断言，形式与物质同等重要；两者都是永恒的，而且两者都不能彼此分开存在。正是两者的结合，赋予一般以基本的特征。形式是一切事物的本源，它们是有目的的推动力，使物质世界形成我们周围无限的多种多样的物和有机体。所有的进化，宇宙的和有机的，都是形式和物质彼此相互作用的结果。可以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是处于唯灵论、先验论与原子论、机械唯物论方面之间。在宗教上，亚里士多德认为神是第一推动力。与柏拉图的善的观念不同，亚里

士多德的神并不履行伦理的目的。神的特点是原始动力，是包容在形式之内的有目的的动作的原始来源。在他的思想体系中，似乎不曾有个人不朽的地位；所有灵魂的作用，除个体的创造理性之外，总是依存于躯体，并和躯体一起消灭。在伦理上，亚里士多德不象柏拉图那样修行禁欲。亚里士多德指出，一切技术、研究、行为，都要以善为目的；个人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都应以至善为目的。它们的目的都是相同的，但只对个人有价值的总不如对国家有价值的，所以国家的善比个人的善更大更完全。他为善提出了一个客观标准，将善或目的分为“为它的”和“自为的”。他说有些善虽本身也是目的，但并非最后的目的。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伦理学上的一个一般原则，即“中庸之道”，也就是不要“过”或“不及”。为了达到这个原则，必须有判断力，首先是要有知识。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思想，都是理智主义的，他们认为理性——知识是判断道德的最高原则，运用自己的理性培养自己的理性的人，似乎是心灵既处于最美好的状态，而且也最与神亲近。不过亚里士多德虽然强调道德中的理性因素，他认为只有哲学的沉思才能达到最高的善，但他没有将这一点夸大到极端。由于他尊重经验事实，他并不认为理性是决定伦理道德的唯一标准，因为决定人们行为动机的，不单是知识——

理性，还有情绪和欲望，后者也是决定人类道德的不可缺少的因素。他并不认为身体是灵魂的禁闭室，也不相信物质欲望必定是邪恶。他说，一个人的最高的善在于自我实现，也就是运用人的本性中最能真实显示出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一部分，因之自我实现以与理性生活相一致。但理性生活依赖于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的适当结合，因而身体必须保持健康，情绪要加以适当控制，以达到“中庸之道”。亚里士多德又是政治学的创始人。他指出了国家的重要性：国家是最高的集体，以至善为目的；国家不仅仅是一个为了进行交换与防止罪恶的社会，“国家的目的是善良的生活”，“政治社会的存在是为了高贵的行为，而不仅仅是为了单纯的共同相处”。他的一句名言——“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是指人不能单个独立生活，只能在社会中生活，所以是社会的动物。人类所以高于其它动物，就在于人有理性，能辨别善恶与正义。就个人说，应该是灵魂统治肉体，理性统治情欲。在社会上，也应该由具有理性、懂得治国之道的人进行统治，而只有体力、仅能担任劳务的人只能被统治。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乌托邦进行种种批判，反对赋予国家太多的统一性，反对废除家庭，反对共产主义，因为共同的财产没有人照管，共有的债务没有人清偿。亚里士多德强调法律的重要性，强调法治，反对人治，因

为法律是没有感情的，没有爱憎，不会偏私。所以他主张根据理性衡量利弊，认清正义与非正义，制定法律，对统治者加以限制，反对终身制，反对世袭制。这和柏拉图的“内圣外王”之道有相通之处，因为他们都主张理性。与其伦理学上的“中庸之道”相适应，亚里士多德主张政治行为中的中庸之道。他认为最好的国家既不是君主政体、贵族政治，也不是民主政体，而是一种polity〔政体〕——即他所设想的在寡头政治和民主政治之间的中间型联邦政体，实质上是一种在中等阶级控制下的国家。他有意使这个阶级的成员保持多数，因为他提倡防止财富集中的方案。他认为只有这样的政府才是一个好的政府，才能达到善的目的。

古希腊三哲人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有突破有发展。特别是亚里士多德，将他们的思想发展到了一个高峰，对人类文化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他们的思想是博大精深的，我们对之要采取“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从中汲取精华和营养，促进中国的改革和开放，促进中国文化的振兴，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水平和文化素质。

这里对古希腊三哲人生平和思想的介绍，是想使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对他们有一个基本的了